

# 目 錄

5 序 / 陳方正

9 導言

## 經 濟 轉 型

18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  
——兼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

41 中國經濟學社的年會及其特點

68 戰前西方對華投資意向轉變之原因

## 企 業 經 營

84 三、四十年代中國民航事業的合資經營

113 戰時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經營活動

137 復興航業公司成立的背景及其經過

## 序

### 現代化之路：競逐富強

對於我們這文明古國在近兩百年來所遭逢的奇劫鉅變，中國學者用心探究的很多，取徑則軍事、工業、政治、社會以至文化、思想等各方面莫不涉及，經濟自亦為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鄭會欣教授這本民國時期的經濟史論文集累積了超過二十多年探究的成績，所涉及的範圍很廣：十三篇文章的主題分別涵蓋了中央政策、國際關係、個別人物、經濟學活動與思潮等大約五個不同範圍，分量也大致相當；至於內容則絕大部分立足於原始文獻的研究和詮釋，所以非常扎實、深入可靠。這風格和鄭教授自本世紀初以來所出版的多部專業論文集可謂一脈相承，那當是得益於他在南京大學受到的史學訓練以及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時所培養的專業精神，當然，多年來在中國文化研究所以享受充分的學術自由，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然而，在中國綜合力量已經脫胎換骨的今天，回顧它當年那些彷彿根本不可能解決的經濟問題和困境，我們究竟能夠得到些甚麼啟示呢？從整體看，答案似乎很明顯和簡單：清末以軍事與實業為目標的自強運動失敗了，這先後導致以政治改革為核心的辛亥革命，和以思想文化運動為核心的五四運動。但無論北洋政府抑或其後的國民政府，它們的努力和企圖都受制於外侮和外來資本的壓迫和干涉，因而無法持續下去，往往成為白費；只有在中國找到適合它本身的政治結構，從而達到完全的統一和自主，也就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它方才能夠不受干擾地探索各種不同發展道路，最後通過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得以釋放自己在幅員和文化上的巨大潛力，這才談得到全面、深入和長期的經濟發展，從而

### 經濟侵略

- 164 日本對華北經濟侵略的鐵證
- 180 華北淪陷時期的貨幣與金融

### 戰時經濟

- 196 陳光甫與戰時中美借款  
——兼論上海銀行家群體的特點
- 215 統制經濟與戰時國營貿易
- 265 戰時國民政府管制物價的措施及其成效
- 307 抗戰後期中美兩國關於外匯匯率的博弈

### 官僚資本

- 352 官僚資本與「官辦商行」

- 401 後記

贏得本世紀初以來令人振奮的局面。

這個觀點很有道理，但是還未能接觸到長遠經濟發展根本問題的核心。從以下兩個不爭的事實看來，那是再也明顯不過了：首先，中國目前雖然在多項工業和技術上領先世界，但以人均產值計，整體發展水平只屬中等，比之西方世界仍然相距甚遠，僅及歐美五六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它繼續發展所遭受的強大阻力正與日俱增，那就像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那樣，同樣是來自西方世界（當然，日本已經被吸納成為其中一員）——雖然其着力點已經從中國境內轉移到境外去了。換而言之，今日中國的經濟固然已經脫胎換骨，水平比之二十世紀初提高到完全不同層次，但它的發展似乎仍然面對着本質上相同的困難，即外力的阻擋、干涉、牽制。這究竟是為何呢？

從國際貿易的角度看，這其實很簡單：就是為了市場的爭奪。在二十世紀初，西方國家是通過不平等條約和生產能力的絕大優勢，來佔領中國市場；現在形勢則顛倒過來：中國是通過西方所建立的自由貿易體制（即世界貿易組織 WTO）和在整體上遠勝於西方的生產能力，來侵奪甚至逐步佔領整個世界包括西方本身的市場，從最初的紡織、鋼鐵、移動通訊、船舶、高速列車，以至當今的風力發電、鋰電池、新能源汽車，都莫不如此，正可謂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經濟奇跡，就是通過這樣的擴張而贏來的。

在當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本來預期能夠通過自由貿易來整合世界經濟，而自己則繼續通過在金融、學術、科技、高端製造等各方面的優勢，繼續掌控製造業「價值鏈」的龍頭，所以考慮再三，終於在本世紀初接納中國加入 WTO。然而，事與願違，此後發展完全出乎其意料之外：中國在「價值鏈」上迅猛攀升，由是令西方製造產業在多個重要領域迅速萎縮，連帶對西方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結構產生巨大衝擊，這是它們在二十一世紀之初所未能預見，也無法想像的。不能夠不承認，當今西方政局之混亂和分裂，有相當部分便是由上述衝擊導致。記得劍

橋大學專門研究中國大型企業的管理學教授諾蘭（Peter Nolan）曾經在本世紀之初宣稱：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的企業很可能會因為競爭實力不足而大量被外資吞併，那甚至可能帶來中國社會的動亂。這無疑是西方專家的預見與日後發展截然相反的最佳例證了。<sup>1</sup> 中國目前經常宣揚「合則兩利，分則兩傷」，這原則在理論上誠然無可辯駁，其實際結果卻絕非當今西方政府所能夠接受，它們近年對中國經濟擴張採取與日俱增的各種強力抗阻措施便是因此而來。

其實，這種抗阻不僅僅是基於經濟考慮，而還有更深層、更根本的理由。那可以從歷史學家麥尼爾（William McNeill）的西方近代軍事史名著 *The Pursuit of Power* 中的一段話說明：「市場化的資源調動緩慢地發展，逐漸證明它比指令（command）能更有效地把人的努力融成一體……（因此）到十六世紀，甚至歐洲最強大的指令結構在組織軍事和其他事業時，也要依賴國際組織和信貸市場。」從此出發，他進而解釋為何小小的荷蘭能夠在獨立戰爭中擊敗強大的西班牙，以及英國為何能夠在七年戰爭中戰勝法國。他的核心觀念是：資本主義和強大軍事力量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正反饋循環」：因為軍備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雖然並非全部）機制，而先進軍備又必須以強大經濟力量作為基礎，「富」和「強」是密不可分，相互促進的。因此他將該書目標定為「試圖彌合軍事史和經濟史……的鴻溝」，而我在編纂「現代化衝擊下的世界」這套翻譯叢書時，就把此書中譯本定名為《競逐富強》<sup>2</sup>。說到底，經濟和軍事不但是兩位一體，而且就是主宰世界權力之底蘊。從這一點看來，西方世界之所以由於中國的經濟飛躍發展而萌生「存在危

1 諾蘭：〈中國大型企業還將何以立足〉，載《二十一世紀》第 59 期（2000 年 6 月），頁 5-19；此文為其在香港中文大學的公開演講講稿的翻譯。

2 William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4)，其中譯本為麥尼爾著，倪大昕、楊潤殷譯《競逐富強》（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文中徵引見本文作者為此書所作序言，在該書新版第 3 頁。

機感」(existential crisis)，務必要千方百計加以阻撓、干涉，甚至損害部分自身利益亦在所不惜，就是很自然、很難避免的了。這是科技飛躍發展而導致全球不可逆轉地融合，所產生的最根本問題之一。它到底要如何才能夠得到解決呢？那無疑是對人類智慧的一場重大考驗。

會欣兄在九十年代初來到中國文化研究所，它本來是以發揚傳統文化為主的，但那時開始有點改變，我們很希望把它擴展到有關現代中國的探索，所以非常高興得到了這麼一位生力軍。此後他展開了民國時期經濟史的多方面研究，又因緣際會，受董浩雲後人付託，編輯董先生遺留下來的日記，由是進而撰寫這位船王的傳記，為中國航運史增添重要篇章。這些和我自己着力的現代化比較研究關係好像不多，不過，從上面的簡短討論看來，卻都可以視為由「現代化」這個大問題所衍生出來的不同探索。因為，廣義而言，所謂「現代化」也者，無非就是西方文明從十五六世紀開始，憑藉其信念、勇氣和先進科學和技術，向全球擴張，從而引起各原有古舊文明的連串反應、模仿、競爭，以求能夠適應此大變局的努力而已；而到了二十世紀末葉，則西方國家本身亦在不知不覺中，被捲入了同樣的模仿與競賽，同樣被迫講求它們本身的「現代化」。因此，歸根究底，「現代化」的本質無它，就是長期和全球性的「競逐富強」而已。

時光荏苒，三十多年彈指一揮間過去，現在會欣兄和我都已經退休多年了，但我們還不時在研究所碰頭，甚至還合作推動一些活動。會欣兄退而不休，除了繼續授課外，厚積薄發，這些年又出版了多部論著，而每當新書出版，他都會贈我一閱，讓我獲益甚多。如今又有新著出版，他很客氣要我為這本集子寫幾句話，遂把讀後感想和一些想法記下來，是為序。

2024 年龍年前夕於用廬

## 導言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二千多年中央專制的帝王政權，建立了中華民國，從此中國改朝換代，走上了共和的道路。雖然中華民國在大陸只存在了短短的 38 年，在這段時間裏，國際上先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又經歷了資本主義國家前所未有的經濟大蕭條；國內的政治局勢極不穩定，從北京政府到南京政府，內閣不斷更換，內戰外戰幾乎沒有停止。然而儘管如此，民國政府畢竟是中國第一個共和政體，正處於由舊到新、急劇向近代化轉變的關鍵時代，而革命的激蕩與政體的嬗變，自然會帶來眾多思想與意識方面的變化，具有承前啟後的重大意義。因此長期以來，民國歷史包括民國經濟史一直都是國內外學者關注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1982 年我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即開始從事民國檔案與民國史的研究，那時正是民國史研究從「險學」向「顯學」轉型的時刻，我正趕上這個史學興盛的年代。當時檔案館正在集中力量編輯《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館領導分配我負責編輯整理民國時期財政金融方面的檔案，我首先編輯的是 1912-1928 年間北京政府時期的內外債，在這之後就負責選編南京政府時期財政金融的資料。在收集檔案資料的同時，我亦結合自己的工作特點，開始注重研究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財經政策以及這一時期的中外經濟關係。我給自己預定的計劃是先從戰前開始，然後逐步向後延伸至戰時和戰後。在檔案館工作期間先後發表了十多篇論文，主要涉及的是戰前這一時期內容。六年多之後，我回到出生地香港，其後相繼在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求學和工作。在這期間，除了擔任饒宗頤教授的學術助手之外，其餘的時間仍繼續從事民國史研究，而研究的時段逐步向後延伸，涉及的領域



亦有所擴充。本書所選編的 13 篇論文，就是我近年來研究民國經濟史的一些成果，我根據各自內容，將其大致分成幾個專題，在這裏先就撰寫這些論文時的想法及其內容作一簡介。

「經濟轉型」一欄收入三篇論文，主要討論民國時期經濟體制、學術思想以及吸引外資等方面發生的變化。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轉型，開始進入所謂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對於這一變化和成就國內外學者幾乎均無異意，甚至對其發生的原因都有共識。傳統的觀念認為，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無暇東顧，暫時放鬆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以致中國的民族資本才有了一個千載難逢的發展時機；然而戰爭一旦結束，歐美列強立即捲土重來，重新強佔中國的市場，所謂「黃金時代」也就曇花一現，一去不復返了。上述觀點根深蒂固，幾乎成為定論。對這個結論我一直在思考，毫無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確實為形成中國的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帶來重大的契機，但是若要尋找中國經濟轉型的真正原因，還必須從中國內部的深層結構去分析和研究。為此，我從民國成立後國民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政府的支持與協助、民族主義思潮的高漲與國貨運動的興起、新生資產階級力量的壯大，以及投資環境的改變等方面，着重分析中國經濟轉型的內部因素，判斷這些才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這就是〈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一文的撰寫背景及其結論。

晚清民初，大批中國的知識分子留學國外，他們不僅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且還帶回了許多新穎的學術觀念，經濟學就是他們創辦的一門新興學科，而中國經濟學社則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學術團體。學社社員數量眾多，他們不是留學歐美或日本的經濟學者、大學教授，就是聲名卓著的金融家和企業家，還有政府中主管財政金融事務的重要官員，學社的領導階層更是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學社成立後秉承「不激不隨，無黨無偏」的宗旨，而其舉辦的種種活動對於提高和普

及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協助政府制定經濟政策、解決現實的經濟問題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經濟學社的年會及其特點〉便主要依據各種資料，重點考察學社成立後召開第一至十六屆年會活動的主題與內容，分析年會形式的演變及其特點，從中觀察學社所關心的經濟問題與當時環境之間的關係，並討論這些活動對國家的經濟決策產生的影響。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雖然一直沒有放棄尋求西方援助的努力，同時也曾採取各種方式和辦法進行嘗試，卻一直收效甚微。然而到了抗戰爆發前的一兩年間，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出現了一個西方各國競相向中國投資的高潮，這在鐵路投資與建設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戰前西方對華投資意向轉變之原因〉就是對這一時期西方對中國投資意向為何由消極轉而積極的原因所進行的一些探索，從中既可觀察此時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以及政府對於吸引外資所做出的努力，同時也能加深了解世界經濟與中國經濟的互動，以及相互之間產生的作用。

「企業經營」亦收入三篇論文，主要探討的是民國時期幾種不同資本公司的創立背景及經營特點。

中國民用航空事業是伴隨着外資輸入而發展的。近代中國缺乏資金，科技落後，發展民用航空事業必須依靠外國技術並吸引外資；而中國幅員遼闊，市場廣袤，發展民航極具潛力，所以歐美各國都對中國的航空事業相互競爭，力圖在中國建立航線、出售飛機、合辦公司。〈三、四十年代中國民航事業的合資經營〉一文即依據原始檔案資料，對於民國時期幾家中外合資經營最具代表性的民航公司，如中國航空公司、歐亞航空公司和中蘇航空公司的創設背景、股份分配、人事安排、經營管理以及飛行路線等方面的史實作一簡要的敘述，並試圖在此基礎上對於引進外資與維護主權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中國建設銀公司是 1934 年由剛剛辭去財政部長的宋子文聯合國內最大的十多家銀行創辦的一家投資公司，公司董事會成員不是政府財經部門的高官，就是金融界的大亨，背景十分強硬。宋子文創設公司的目

的就是想借助政府與財閥的勢力，吸收外資，積極投資鐵路、電力等事業的發展，從而推動國內的經濟建設。然而正當公司事業發展蒸蒸日上之際，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公司的各項業務遭到了嚴重損失。在全面抗戰的年代中，公司仍然向外謀求借款，冀望打通國際通道，並在大後方開辦企業，堅持抗戰。〈戰時中國建設銀公司的經營活動〉一文介紹了公司在抗戰期間慘澹經營的過程。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國民營航運業同仇敵愾，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借用輪船轉運物資；同時又奉命在長江各處沉船，以阻止日軍進攻，為此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為了賠償戰爭期間徵調民間輪船的損失，經與民營航運業公會及各受損船東商議，同意以政府的名義向美國購買輪船。購船費用部分是政府支付的賠償金，其餘不足部分，則由政府出面擔保借款，從而購買了美國戰時生產的十多艘大型的「自由輪」和「勝利輪」，並在此基礎上成立了一家由各船東合股的新型航運公司。〈復興航業公司成立的背景及其經過〉詳細地介紹了這家航運公司是如何利用國家賠償購買美國船隻，並通過民間合作而創辦的經過。

「經濟侵略」一欄收錄的兩篇論文，是我在整理中國文化研究所資料過程中的意外收穫。

二十多年前，我奉命整理中國文化研究所保存的兩大箱資料，發現其中有一部篇幅甚大的資料匯編，經認真閱讀，發現它的價值十分珍貴，這就是抗戰勝利後由河北平津敵偽產業處理局經濟資料室在接收敵偽機關各種調查資料的基礎上，整理和編撰而成的一部資料匯編，題目就叫《戰前及淪陷期間華北經濟調查》。眾所周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存在已久，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的各個情報機關就開始對華北各省區的自然資源、礦藏分佈、人文地理、城市人口等各種資源進行調查。抗戰勝利後，這些資料經過平津敵偽產業處理局工作人員的精心整理，不僅內容十分詳盡，而且是一孤本。這部資料不僅能印證日

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野心，同時也可以為現實的經濟建設提供參考。天津古籍出版社得知這一發現後，立即主動聯繫我，願將這部資料集全部影印出版，而在我的建議下，香港中文大學和中國文化研究所也同意將原件移交給天津市檔案館永久保藏。〈日本對華北經濟侵略的鐵證〉就是我在編輯這部資料集後所撰寫的前言，而〈華北淪陷時期的貨幣與金融〉則是我利用這部資料集完成的論文。

「戰時經濟」收錄的四篇論文相對來說篇幅都比較大，而且這個問題也是我近年來關注的一個重點。

抗戰爆發前後，國民政府曾採取各種方式，積極向外尋求援助，陳光甫作為一位著名銀行家，1936年，他擔任中國特使與美國財政部簽訂中美白銀協定，不僅保證了幣制改革的順利實施，而且與美國財政部高層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抗戰爆發後，他又受政府委派，前往美國洽商借款，幾經談判，終於取得成功，而且為日後向外借款開創了一種新的方式。〈陳光甫與戰時中美借款〉一文不僅介紹了陳光甫在借款中與美方進行的種種外交活動，還以陳光甫為代表，分析民國時期上海資本家這個群體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

戰時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外援，必須保證大批農礦產品出口換取外援，為此中國由平時經濟改為戰時經濟，管制外匯，並對所有出口物資實施統購統銷。當時中國出口的重要物資中特礦產品均由資源委員會負責，而其他如桐油、茶葉、豬鬃、生絲等農產品則由貿易委員會承擔。以往學界對於資源委員會的研究較為重視，但涉及貿易委員會的作用卻乏人問津。二十多年前我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並收集大量檔案資料，對於貿易委員會實施統購統銷的過程及其屬下幾家國營公司中國茶葉公司、富華公司和復興商業公司的創辦過程予以深入的研究，在這基礎上完成了一部專書，而〈統制經濟與戰時國營貿易〉則是對該領域研究的一篇總結。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對中國造成嚴重的傷害和巨大的消

耗，再加上交通受阻、外援中斷、人口遷徙等原因，導致戰時大後方物資短缺，物價暴漲。國民政府在募債、增稅都無法解決赤字上升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大量發行貨幣予以舒緩，但這就更加刺激物價的上漲，通貨膨脹日益加劇。戰時政府既要保障前方軍隊的戰備物資和糧食供應，也要維持後方軍公教人員及普通市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因此必須對物價實施管制，〈戰時國民政府管制物價的措施及其成效〉就是通過戰時政府從評議物價、平抑物價到限制物價政策的演變，分析抗戰以來政府對物價的統制政策經歷了一個從管得少到管得多、從管得鬆到管得嚴的過程。應該承認，這些措施對於堅持抗戰、穩定物價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上述政策在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失誤。由於解決物價的根本問題是要增加生產，保證交通運輸，疏通物資交流，擴大商品供應，然而在戰爭的環境下，實際上這些問題又都是無法根本解決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加入同盟國，國際地位上升。與此同時，美國也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援助，不僅提供借款和物資援助，派往中國的軍事人員亦隨之大增，並在中國的大後方修築多處機場。根據雙方協議，美軍駐華官兵的日常消費以及修築機場的費用由中國先予墊付，日後再由美方結算成美金還付中國。這本是雙方互贏的一個方案，卻因為在外匯匯率的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執，中國要求按照官方匯率結匯，但美方堅持要求以市場價格結算，彼此間爭執日久。這場外交爭論不單成為抗戰後期中美雙方外交談判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也對戰後美國的援華態度產生了重要影響。〈抗戰後期中美兩國關於外匯匯率的博弈〉一文就是根據中美雙方的歷史檔案，分析歷史上中美外交關係發生的一段往事。

本書收錄的最後一篇文章內容討論的是「官僚資本」。

在中國，「官僚資本」是個耳熟能詳的名詞，而且長期以來一直與「國家資本」、「四大家族」聯繫在一起，然而這主要是政治上的宣傳。從科學的意義上來說，「官僚資本」應該指的是「官僚的資本」，它既

不能與國家資本劃等號，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四大家族」的私有資產；但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這些官僚及其子弟創辦的公司憑藉與政府之間密切的關係，依仗特權，以權謀私，在商業活動中賺取了超額利潤，因此它們又與民族資本具有巨大的差異。多年來，我一直關注這個問題，並進行個案研究，先後對受到朝野輿論一致攻擊的所謂三大「官辦商行」，即中國建設銀公司、孚中實業公司和揚子建業公司分別予以深入研究。十多年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兩岸三地五十多名學者分別撰寫中國近代史的相關內容，我被指定的題目就是〈官僚資本與「官辦商行」〉，其後該文被收錄在《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民國卷」一書中。在這之後，我又在此文的基礎予以擴充內容，目前已完成一部 30 萬字的專書，希望不久後能奉獻給讀者。

以上就是對本書收錄論文書寫的提要，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民國經濟史的內容十分豐富，本書收錄的這些論文只是其中之萬一，斷然無法反映民國經濟史的全貌；而且各篇內容雖然均與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有關，但涉及民國的各個時期和範圍，題目亦比較分散，因此如何命名，則是一件極費思量的事。以財政經濟方面來說，民國各個時期的中央政府為了應付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均會實施一些相應的措施，目的當然是希望維持與鞏固自身的政權。在這期間當政者對於前朝政府的經濟政策既有延續，也有相當大程度的變革；在改革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錯誤的決策；而整個民國時期的國民經濟既有短暫的經濟繁榮，更多的還是持續多年的財政危機。雖然民國歷史存在的時期不長，而且戰亂頻仍，但這是一個承上啟下的變革階段，其間政府推行的財政經濟政策多有變化，對近代中國的經濟變遷自然產生了重要作用。因此思來想去，就以《延續與變革：民國經濟史析論》作為書名，冀望能從一個側面反映民國經濟史之一斑。



# 經濟 轉型





## 辛亥革命與中國的經濟轉型

### ——兼論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

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一些偶發事件所激起的突發事變，但實際上卻蘊涵着許多深層的政治、社會、經濟因素。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延續二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所建立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僅僅是更換幾個帝皇。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辛亥革命不僅是一場深刻的政治革命，更是一場觸及國人靈魂的社會變革。從此共和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實業救國」的口號響徹雲霄。以辛亥革命為標誌，中國的經濟體制也由此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資本主義開始進入所謂「黃金時代」。本文主要通過大量的資料來顯示辛亥革命後中國經濟轉型的具體表現，同時深入探討形成這一時期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

#### 一 經濟轉型的具體表現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雖然明清之際在中國的東南、華南沿海等富庶地區開始出現某些資本主義萌芽，但從整體上看，整個國家仍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其主要經濟形態。然而鴉片戰爭的爆發打破了歷代王朝興替的循環過程，列強用大砲打開了中國

數百年來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的傳統社會經濟形態也開始發生變化。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和晚清新政，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開始發生並出現了顯著的發展，而辛亥革命的爆發，更使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產生重大的變化。以此為標誌，中國經濟的近代化由量變到質變發生飛躍，開始從傳統的農業型經濟向近代化的工業型經濟過渡，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的數據加以證實。

#### （一）工礦業的蓬勃發展

衡量一個國家近代化程度的標準有很多，然而毫無疑問，國家的工業化則是近代世界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因此我們應首先觀察一下近代機器化工業的發展狀況。

鴉片戰爭後不久，外國資本便率先在上海、廣州等商埠經營起近代工業，在這些工廠中出現了中國最早的產業工人。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清政府開始經營近代軍事工業，其後又陸續開辦一些採礦、煉鐵和紡織工業，這大都是國家投資並經營的官辦企業。直到七十年代之後，中國的民族資本才開始陸續投資近代工業，但是這些企業一般來講規模都比較小，遠遠不能與外資和官辦實業相比。然而到了甲午戰爭以後，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近代工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據統計，民國元年和民國二年全國新辦企業就分別多達 2,001 家和 1,249 家。<sup>1</sup> 儘管有些工廠開辦不久便停工結業，但從中還是可以看出當時人們投資工業的高漲熱情。有關中國近代工業成長的情形請看下表。

1 陳真、姚洛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頁10。

表 1 中國近代化工廠的成長（1895-1920）

	1895 年前	1913 年前	1920 年前
工廠數	108（其中官辦 31）	698	1,759
資本（千元）	182,603（其中官辦 175,312）	330,824	500,620
工人數	84,571（其中官辦 47,421）	270,717	557,622

說明：本表所列工廠不包括外資在華投資企業，其中 1895 年前含官辦與商辦兩大部分，1913 與 1920 年雖未加區分，但應以商辦企業為主。

資料來源：根據陳真、姚洛合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北京：三聯書店，1957 年）頁 54-56 表改製。

我們再來看看民國初年中國近代工業投資規模的演變情形。

表 2 辛亥革命後中國近代工業投資規模的演變（1912-1920）

年份	1 萬元以下		1-5 萬元		5-10 萬元		10-20 萬元		20-50 萬元		50-100 萬元		100 萬元以上		合計 廠數
	廠數	比例	廠數	比例	廠數	比例	廠數	比例	廠數	比例	廠數	比例	廠數	比例	
1912	522	53%	241	25%	68	7%	60	6%	49	5%	12	1%	25	3%	977
1913	501	50%	294	29%	68	7%	55	6%	42	4%	17	2%	16	2%	993
1914	551	48%	305	26%	85	7%	73	6%	95	9%	19	2%	22	2%	1150
1915	476	42%	359	32%	86	8%	90	8%	67	6%	23	2%	26	2%	1127
1916	445	42%	302	29%	111	13%	88	8%	34	3%	21	2%	38	3%	1039
1917	387	37%	305	29%	112	13%	79	8%	76	7%	29	3%	36	3%	1024
1918	378	40%	275	29%	86	9%	79	8%	78	8%	27	3%	33	3%	956
1919	244	32%	224	30%	73	10%	71	9%	76	10%	21	3%	43	6%	752
1920	204	31%	161	24%	66	10%	57	9%	82	12%	33	5%	57	9%	660

資料來源：龔駿編：《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119-120。

上表反映出的一個明顯趨勢就是投資規模的相對集中，其中資本在 5 萬元以下的工廠大幅下跌，5 萬至 20 萬規模的工廠則基本維持不變，而 20 萬以上投資規模的工廠卻顯著上升（以廠家數目計算，1922 年資本在 20-50 萬的工廠增加了 67%，50-100 萬增加了 175%，100 萬以上的則增加了 128%）。因此全國工廠總數雖然有所下降，但投資總額卻持續上升。據一項日本人的統計，1919 年中國大規模的新式工廠共有 335

家，資本共計為 133,228,960 元，平均每廠資本大致為 40 萬元左右。<sup>2</sup>

近代中國工業規模最大的是輕工業，其中又以棉紡織工業的發展速度為最快，因此棉紡織業的發展情形便可視為中國近代化工業的一個縮影。據統計，1912-1927 年全國新設立華資棉紡廠共 86 家，創設資本 136,703,000 元；而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全國僅設立華資紗廠 24 家，資本亦僅有 18,630,000 元。<sup>3</sup>一些著名的紡織廠如榮氏兄弟的申新集團、郭氏的永安紡織公司以及位於天津的華新、裕元、恆源、北洋等廠也大都創辦於此時。下表反映的就是民國初年中國棉紡業發展的大致情形。

表 3 民國初年中國棉紡業的發展（1913-1922）

年度	紡錠數		織機數		棉紗產額 (千包)		指數 (規元兩 / 每包紗)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指數	
1913	836,828	100.0	5,980	100.0	400	100.0	-----
1914	855,196	102.2	6,430	107.5	531	132.8	14.00
1915	976,620	116.7	7,830	130.9	531	132.8	-3.13
1916	1,288,152	153.9	9,030	151.0	834	208.5	5.45
1917	1,280,672	153.0	9,530	159.4	867	216.8	26.40
1918	1,456,012	174.0	10,926	181.7	900	225.0	15.33
1919	2,366,722	282.8	13,796	230.7	1,100	275.0	50.55
1920	3,110,546	371.7	15,316	256.0	1,340	335.0	46.75
1921	3,191,546	381.4	16,324	272.0	1,500	375.0	7.30
1922	3,266,546	390.3	16,224	272.0	1,006	251.5	-14.75

說明：盈利是按市價推算之 16 支紗每包紗價扣去生產費用（包括原料及其他費用）後之所得。

資料來源：紡錠及織機數參見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四輯（北京：三聯書店，1961 年），頁 201；棉紗產額參見同上書，頁 308；棉紗廠盈利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年），頁 186。

2 日本《遠東時報》(The Far Eastern Review)〈工業公司增刊〉，轉引自龔駿編：《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頁 120。

3 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1840-1937》（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頁 109。